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的根源

王冠宇

【内容提要】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到车臣后与民俗和传统相结合,呈现出某些本土化特征,但在早期传播及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未显现出极端主义倾向。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车臣迅速膨胀,始终严重地威胁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究其成因,主要有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危机、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和支持、俄(苏)政策上的失误等。探究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车臣的形成和根源,将使人们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车臣 伊斯兰 极端势力 民族分立 恐怖活动

【作者简介】 王冠宇,1970年生,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近一个时期以来,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在俄罗斯境内连续制造多起绑架、爆炸等恐怖事件:2002年8月19日,车臣恐怖分子用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将俄军一架米-26直升运输机击落,机上114名俄罗斯军人遇难;同年9月15日,车臣恐怖分子试图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的潘基西山谷潜入车臣境内,虽被俄边防部队拦截并击溃,但俄也损失了一架米-26直升机,12名边防军阵亡;10月11日,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警察局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造成40多名正在开会的警察死亡;10月23日,约50名恐怖分子闯入莫斯科东南区轴承厂文化宫,劫持800多名人质,威胁俄政府在7日内从车臣撤军,否则炸毁整栋大楼,杀害全部人质。虽然俄特种部队将大部分人质解救出来,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质死亡118名^①。

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这些恐怖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两次俄车战争的继续,它严重地破坏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冷战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绵延十几年,并使自苏联解体后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俄罗斯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中呢?对这

个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认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本质,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车臣的伊斯兰化及其极端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 车臣概况。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21个共和国之一,位于俄南部高加索山脉的北侧,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00万。1859年并入沙皇俄国版图。苏联时期,车臣原是一个自治州,1936年与印古什自治州合并,建立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苏联当局认为车臣人在卫国战争中与德国纳粹勾结,将大部分车臣人迁至中亚,直到1957年,车臣人才被允许返回故土。1991年“8·19”事件后,车臣开始走上分离道路。同年10月,车臣进行“总统选举”,曾为苏联少将的杜达耶夫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同年11月1日,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主权国家”,并组建了“国民军”,镇压反对派,与俄联邦政府呈对峙之势。为解决车臣问题,俄罗斯在

^① 岳松林:《莫斯科全城大搜捕》,《环球时报》2002年10月31日。

1994~1996年、1999年两次出兵车臣。目前,虽遏止了其分裂势头,消灭了车匪部分有生力量,但其残余分子龟缩到俄南部山区,仍在负隅顽抗,频频制造恐怖事件。

二 伊斯兰教传入车臣及其本土化过程。16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是当地达吉斯坦人,以后缓慢地向周围地区扩散,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传播到车臣和印古什地区,并很快成为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形态^①。但伊斯兰教在车臣、印古什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未显现出极端主义倾向。

车臣人自古骁勇强悍,长期的山地生活形成独特的民族传统,一些未成文的法规根深蒂固,有很深的伊斯兰渊源。伊斯兰教与当地民族习俗、地方传统结合而成的内容庞杂的成规,严格规定了车臣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亲友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伊斯兰教信徒们在严格遵守成规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车臣山民特色的教派(一般称为苏菲派,但与传统苏菲派又有区别)。

在沙俄统治时期,车臣是一个比较封闭自守的社会,虽然说有7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但信徒并不虔诚,也不刻意去完成宗教功课,宗教活动只限于在“亲族”和“邻族”之间,由有威望的长者主持宗教仪式,当地人称他们为毛拉。每个毛拉的活动是相对独立的,不必对宗教领袖或有关机构负责。由于毛拉对经文理解往往受其知识水平的限制,并掺杂有个人的偏好,长此以往,这些毛拉以个人形成的世界观和民族传统为基础去理解伊斯兰教义、教规,并影响着其他信徒,经代代相传,原来“纯正”的教义、教规已面目全非,宗教生活变得较为混乱、低调。年轻人虽有责任参加宗教仪式,但可以不经文,对教义理解也不是必须的,这种现象在车臣穆斯林生活中被认为是很正常的^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成熟的教义、教规渗入民族习俗中被流传下来,这使得“传统伊斯兰势力”在车臣特别强大,任何对传统的侵犯都被车臣人视为亵渎神圣。

在苏联前期,由于无神论宣传,禁止多元意识形态存在,使车臣伊斯兰教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少数信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多数穆斯林淡化了宗教感情,暂时中断了其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与

交流,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信徒已不能按照伊斯兰教法要求去完成礼拜、封斋、割礼、葬礼和朝觐等必须履行的宗教仪规。

三 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形成及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开始向车臣渗透,并迅速扎根,不断蔓延和膨胀。经过20多年的经营,在车臣形成了强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所谓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旗帜,以车臣为根基,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以动听词藻宣传激进的教义,煽动蛊惑信徒,破坏现存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抨击信仰不忠者、叛教者和异教徒,并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从事分立和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搞宗教活动,而是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的活动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宗旨,破坏了宗教的声誉^③。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苏联解体是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想在车臣扩散、激进教派组织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由于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外来宗教极端思潮开始侵入车臣,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也通过两条途径渗入车臣:一是车臣穆斯林去国外朝觐后而带回的激进思想;二是外国传教士在车臣传教。但最初这种外来思潮受到抵制和打压,因为它的教义、教规非常激进,否认了“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存在,主张用伊斯兰民族取而代之,推翻了穆斯林民间伊斯兰教的传统形式和准则,有违车臣传统伊斯兰教旨,车臣中老年穆斯林甚至把它视为异端。原教旨主义者在初期碰壁后,开始调整策略:出资修建清真寺、经学院和一些伊斯兰教研究机构,收买神职人员,提供资金让信徒去国外朝觐,免费为车臣青少年提供赴境外伊斯兰学院学习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原教旨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蓄,逐渐在车臣形成了组织,并网罗了众多信徒,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

从杜达耶夫上台到第一次车臣战争(1991~1994年),车臣激进伊斯兰教派不断向政权靠拢,并逐渐发展壮大阶段。杜达耶夫进入车臣权力中

① M. 尤索波夫:《车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伊斯兰教》,〔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0年第2期。

② C. 阿巴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成因及预测》,〔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2年第2期。

③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05页。

心后,使车臣共和国的宗教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车臣的新首领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政治资本,要树立威信、巩固政权地位,必须利用伊斯兰教去欺骗和招徕自己的信众。经杜达耶夫策划、煽动后,一批宗教伪善者称:“杜达耶夫是救世主,他将引导车臣人民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异教徒中独立出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车臣很快出现了许多“目击者”,称他们曾亲眼看到杜达耶夫从天而降。但所有的一切都与传统伊斯兰教派利益相悖,在初期宗教仪式的集会上,各派争吵不休,不同教派信徒间经常爆发冲突,这些冲突导致车臣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杜达耶夫政权开始逐步向伊斯兰极端教派倾斜,同时指责传统教派组织与俄官方特工部门合作,有违“纯正的伊斯兰”教义。原来对立的几个激进伊斯兰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真玛特”、“伊斯兰青年”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并在1992年成功地组织了杜达耶夫去沙特阿拉伯的朝觐。从沙特阿拉伯返回后,车臣总统开始加大了车臣伊斯兰化思想的调门,并在新一届车臣穆斯林大会上确定了今后的目标:“建立一个无民族特色的伊斯兰国家”。大会的纲领与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口号是一致的^①。这使得激进教派在发展中有了政权上的支持,很快就形成规模,并在与传统教派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1994~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激进教派信徒拿起了武器走向了行为上的极端,同时他们与民族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相勾结,并最终形成了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军事冲突期间,车臣领导者们感到财力匮乏、人力不足,开始对极端教派信徒及其财力的支持感兴趣了,一方面,“车臣政治精英”极力渲染这次冲突,把俄罗斯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分裂势力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异教徒对车臣的侵略,把俄罗斯政府军队说成是东正教部队,这在车臣穆斯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像“伊斯兰民族党”和“高加索伊斯兰统一运动”等伊斯兰极端组织不但加强了彼此的联合,而且它们的信徒也在“反抗异教徒的侵略”、“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口号下纷纷拿起了武器,加入了杜达耶夫民族分裂势力的阵营^②。另一方面,“精英”们为最大限度地吸引新成员,加强已有的阵营,鼓舞“信徒”的士气,还提出了“对俄圣战”、“建立伊斯兰教教法

国家”的口号,这进一步迎合了境内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利益,使得两股恶势力越走越近,最终合而为一,形成了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两年的俄车战争中,他们以宗教为幌子,以分立为目的,以恐怖为手段,不断与俄军周旋,最终迫使俄政府从车臣撤军,签订了“哈萨维尤尔协定”。

从1996年俄军撤出车臣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前,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极端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并进一步发展壮大。1996年,俄政府将军队撤出车臣后,实际上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在“协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武装自己,他们提出了“将圣战进行到底”的口号,继续网罗信徒,建立训练营地,培训非法武装。与此同时,在独联体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内被打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也纷纷逃窜到车臣。在那里,这些“外来客”不但没受排挤,而且还大有“用武之地”。他们与当地恶势力充分结合,不断从事犯罪和恐怖活动,聚敛了充足的活动经费。不仅如此,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还利用北高加索地区居民浓厚的伊斯兰情结,蛊惑周边地区的穆斯林群众投入到“消灭和驱除异教徒”的“圣战”中来,企图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化^③。

从1999年俄车战争到现在是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趋于灭亡,垂死挣扎阶段。为彻底解决车臣问题,俄联邦当局于1999年出兵10万在车臣全境展开大规模清剿极端势力的行动,大股非法武装被消灭,但是仍有部分残余分子龟缩到俄格边境的潘基西山谷,他们在车臣内外采取“游击战术”,频频进行爆炸、绑架人质等恐怖活动。其所作所为遭到包括车臣居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痛恨和谴责,失去民心和地利的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已是穷途末路。但是他们在境外极端势力的庇护下,仍有一定生存和垂死挣扎的余地。最近他们在莫斯科绑架人质以及在车臣共和国制造多起恐怖事件就足以证明这股恶势力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特点是:

① P. 扎巴罗夫:《极端主义者反对传统主义者——现代车臣伊斯兰因素和外来力量》,〔俄〕《独立报》1999年10月20日。

② K. 波梁科夫:《俄罗斯北高加索社会生活正在与伊斯兰革命的方向和企图发生冲突》,〔俄〕《独立报》1999年9月1日。

③ 何希泉主编:《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2页。

(一)与俄世俗社会没有调和余地,力图按照伊斯兰教法典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脱离俄罗斯联邦而独立;(二)为夺取政权,采用破坏现存社会稳定的极端恐怖手段,同时与所有能够有助于伊斯兰化的力量结盟,首先是和分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结盟;(三)否认俄罗斯文明的统一,认为宗教冲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四)与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联系密切,遵照其旨意活动;(五)竭力向年轻一代灌输“仇俄”思想,注重力量的集聚和后续力量的培植。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 恶性膨胀的根源

一 社会因素。伊斯兰极端势力需要特定的土壤,才能滋生蔓延。近年的车臣状况正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一是贫穷落后,失业严重。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相比,车臣在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都相对落后。据俄新社报道:“20世纪70~80年代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有20多万青年劳力无法在自己共和国内找到工作,每年被迫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找工作的人数有7万~8万。”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民族分立分子闹独立,内部派别林立,纷争激烈,车臣当局无暇顾及经济发展,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车臣战争给车臣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居民贫困化达到了极限,现有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青年人失业率占55%,很多没有工作的人迫于生活的压力参加战争和恐怖活动^①。正是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使极具破坏与侵略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滋长蔓延。二是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率居高不下。车臣自走上分离道路后,内部治安就混乱不堪,犯罪率连年呈上升之势,特别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阵营,通过非法敛财手段获得了大量的活动经费:他们从倒卖石油、印制伪钞、绑架人质、做毒品交易等非法活动中获利高达100亿美元。此外,他们还把俄罗斯向车臣提供用于恢复建设,发放工资、退休金的160亿卢布装入自己的腰包^②。财大气粗的极端分子利用社会混乱的局面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小型犯罪团伙和个人为寻求庇护,纷纷投其麾下;另一方面是抱有“整治社会”的热血青

年为了寻求“理想”,也纷纷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此外,他们还用欺骗、威逼和恐吓等手段将部分居民招募到自己的旗下。三是居民对伊斯兰教知识的缺乏。车臣居民被俄罗斯人称为“山民”,这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车臣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其次是指车臣人生活贫困,居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沙俄和苏联时期为了便于统治,对车臣居民都采取“愚民”政策,而车臣历届当局也不注重文化教育,这使得车臣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府少得可怜,“通晓阿拉伯语并对《古兰经》素有研究的人即使在宗教权威和学者中也是凤毛麟角”^③。在这种情况下,信徒们很容易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和侵蚀,特别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诱惑下,使车臣人易失去辨析和抵御极端思想的能力。

二 意识形态危机。宗教是人们的一种信仰,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产生极端思想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人的心理因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对社会的不满等等,都会使人产生逆反心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需要找到发泄的对象,很容易被有政治目的且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分子利用。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令,确立了其宗教政策,规定了公民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不干涉公民世俗生活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进行无神论宣传和反宗教运动,强调用科学共产主义体系取代宗教世界观,用战斗的无神论消除宗教偏见。在未充分关注穆斯林民族经济和历史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国家就试图向其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车臣表现尤为突出。逆反心理、排俄情绪已深深地扎根于车臣穆斯林心中,并由此引发了1922~1936年和卫国战争期间两次具有宗教色彩的骚乱。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期间,原有的社会道德价值观被冲垮,人们失去了信仰,普遍感到迷茫,精神和思想意识出现了危机。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时,车臣穆斯林“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

① C. 米尔科夫:《伊斯兰因素对俄罗斯军事政策的影响》,〔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0年第2期。

② 肖勤:《车臣问题纷争难断》,《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

③ 杨艳丽:《瓦哈比与车臣战争》,《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

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思想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极端分子看准时机,在车臣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对苏俄政策不满和目前生活现状困窘的情况下,宣扬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及其对车臣的征服和统治时期的黑暗面,主张只有“回归伊斯兰教”、“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他们还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是真主的旨意”。一些信仰彷徨者,特别是那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到政府施行经济自由化希望的破灭,看到财产分配不公的灾难性增长,以及俄罗斯在世界威信的下降,开始相信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说教,并狂热追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是救世的,既然是按真主的旨意行事,那么他们从事任何事情、怎么做都不过分,这也是极端主义者能把车臣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需求的人吸引在自己的旗帜下,从事分裂和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①。

三 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伊朗革命的成功,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这正逢苏联民主化改革前期,政府对宗教的管制和监控已开始放松。因此,伊斯兰复兴运动对车臣穆斯林的生活影响极大。在短期内,信徒人数和清真寺数量大幅度增加。从1979年到1991年,车臣新开放了200多个清真寺,同时兴办了诸多经学院和伊斯兰教研究机构。与此相矛盾的是,车臣本土上有伊斯兰知识的传教士、教师、神学家和研究人员相当匮乏,而对此类人员的需求当时都面向了国外,这正迎合了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利益。它们趁机派出众多的传教士和神学家到车臣,不仅带来了激进思想和充足活动经费,而且还担负着“极端”任务——建立政教合一组织,广吸信众;制造事端,促使社会矛盾激化,推动民族分立运动;创造条件与车臣政府官员和穆斯林议员接触,争得权力机构和人士的庇护。为此,他们将成千上万册的《古兰经》和其国内被禁止出版的伊斯兰文艺著作运到车臣,并免费发放;收买车臣宗教活动家为其激进思想宣传;出资修建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提供费用让极端骨干分子去沙特阿拉伯朝觐^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相当注重后续力量的培养和发展,资助车臣众多的青少年到国外伊斯兰学校学习,在那里他们向这些世界观尚未成

熟的青少年灌输了激进的伊斯兰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青少年”陆续回国,并将所学的激进思想传给亲邻和所能接触的人,具有激进思想的穆斯林是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的主要人力来源。

20世纪90年代初,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还在车臣建立了地下半军事化武装训练营。在训练营内,国外教官和传教士向青年人兜售狂热的极端思想,并组织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些青年人被称为伊斯兰未来保卫者,在车臣这些训练营的文件备忘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在军事组织中发展青年人的体质与思想,他们可以完成车臣在解放祖国的运动中未完成的事业,受到伊斯兰民族精神灵魂熏陶的年轻一代可以成为未来民族军队中的脊梁”^③。这些训练营在车臣危机时很快变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军事培训中心。

在车臣战争期间,境外伊斯兰极端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支持车臣分离势力,而且还派出众多的雇佣军直接参战。在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失利逃亡的情况下又提供避难所。

四 俄(苏)政策上的失误。首先是文化政策上的失误。苏联自列宁逝世后,实行了压制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政策,过分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对宗教和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不加区分地一律给予限制和打击,急于将各民族文化统一到以俄罗斯文化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之中,这不可能不伤害包括车臣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造成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俄罗斯独立后,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中照搬西方模式,而这一模式下的文明与车臣传统成规是不相容的。在车臣两派激烈争斗的混乱时期,多数中间派别的穆斯林不知所措,俄罗斯政府又没正确地引导,而伊斯兰极端分子却打出了“纯正伊斯兰”、“回归虔诚的哈里发时代”、“创建伊斯兰社会国家”等口号,这些口号在《古兰经》和《圣训》的信条中又确有规定,因此欺骗性很大。其次是宗教政策上的失误。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俄罗斯

① И.多巴耶夫:《在北高加索现代民族政治化进程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0年第6期。

② М.穆尔达金:《穆斯林与俄罗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俄〕《中亚与高加索》杂志2000年第1期。

③ Р.扎巴罗夫:《极端主义者反对传统主义者——现代车臣伊斯兰因素和外来力量》,〔俄〕《独立报》1999年10月20日。

迫于东正教的压力发布了一些有利于东正教发展的法律,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除东正教之外还存在其他宗教。各种政治力量还利用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极力宣扬东正教,企图把东正教变成俄罗斯的国教。他们劝人相信,东正教(再加上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思想)可以成为永远支撑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而且它将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还说,全部恢复东正教的荣耀和力量,能使俄罗斯恢复昔日的强大和兴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东正教在经国防部同意后还派出多名神父去军队营地做祈祷^①。凡此种种,造成联邦中央和穆斯林民族之间关系紧张,造成了伊斯兰教徒对俄罗斯国家的疏远,对东正教徒的嫉恨,这些宗教政策及导向上的失误被极端分子利用和渲染,提出了“宗教战争不可避免”,“穆斯林民族应当摆脱异教徒统治”等口号。第三是俄罗斯在对车臣一些政策的具体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受苏联解体后遗症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车臣民族分裂活动就很猖獗。但俄罗斯上层正忙于权力争夺,同时受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困扰,无暇处理车臣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坐大提供了机会。叶利钦执政初期倡导的所谓民主政治,盲目扩大地方自主权,为地方分离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地方只向中央要拨款,却不向中央财政上缴资金,导致地方分离倾向不断加深。1994年俄罗斯匆忙出兵车臣,又在舆论导向上处于被动。1996年俄车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对车臣局势再次放任不管,这进一步助长了极端势力的气焰,并赢得了发展壮大时间。在上世纪最后几年,俄罗斯又频繁更换总理人选,使政府在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时未能出台切实可行的治理政策^②。

几点思考

一 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俄政府冲突的实质和症结。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俄联邦政府冲突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者(其主要成员是车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为了个人的私利,将车臣推向了战争。他们企图将车臣的政治、经济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众所周知,位于高加索北部的车臣境内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建筑材料和水资源

等。对此觊觎已久的车臣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大好时机”,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伊斯兰教在车臣复兴所形成的群众基础,打着“回归伊斯兰社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幌子,窜入车臣政权机构,并称他们代表车臣民众的利益,是民意的代言人。实际上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膨胀的政治欲望促使他们要将车臣分立出去,为麻痹民众、积蓄力量,他们必然要打伊斯兰教的牌。这与俄罗斯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形成尖锐对立。这种关系是不可调和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利益上考虑,还是从民族、国家利益上考虑,都不会让这股恶势力存在。为了不在其他共和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俄联邦政府势必加大清剿力度,彻底地铲除这股恶势力,从而才能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

二 俄罗斯在处理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所取得的经验:1. 注重媒体的作用,确定国家利益至上的报道原则。1999年在车臣剿匪过程中,普京汲取上次出兵时舆论处于被动的教训,牢牢地控制新闻媒体的宣传,严格规定西方记者的活动,对歪曲事实的报道予以有力的回击,同时借用媒体的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揭露极端分子的暴行和真正企图,让世人和车臣人民切肤地感受到这股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势力,是为少数人谋求私利,并不代表广大车臣民众的心声^③。

2. 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事务,抵制西方国家干预。西方大国不断在车臣问题上做文章,对俄施加压力,其最终目的是“弱俄遏俄”,取得战略上的主动,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叶利钦在第一次出兵车臣时,没能顶住西方的压力,在1996年被迫撤军,使得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发展壮大的可乘之机。在第二次俄车战争中,普京态度明确,多次强调车臣问题是俄罗斯内政,不准国际社会插手,使俄军能够安心地清剿车匪。

3. 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要善于处理各种矛盾,争取主动。车臣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① 王哲:《神甫为车臣而战》,《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3月。

② A. 萨瓦杰耶夫:《瓦哈比主义者反目成仇》,〔俄〕《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杂志2002年第7期。

③ 刘武英:《试论车臣战争中新闻宣传》,《当代传播》2000年3月。

时,俄当局曾寄希望于对车臣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利用当地反对派来推翻杜达耶夫政权,消除分离势力,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伊斯兰极端势力得以膨胀。普京上台后,利用车臣上层社会的矛盾,分化瓦解,结果不少温和派人士纷纷投诚,进一步锁定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在第二次俄车战争中,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对居民进行骚扰,绑架人质,报复同情俄军的车臣居民,这使得双方矛盾十分激烈;相反,俄政府军纪律严明,在维护车臣社会稳定、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虽付出巨大代价,却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4. 用车臣人解决车臣问题。普京在清剿车匪时十分注重在车臣共和国内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2001年已安排10万个工作岗位,2002年又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退休金按月足额发放;部分学校复课;医院开始接待患者;20万难民返回家园,在车臣居民中营造反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这股恶势力的力量。2002年5月份,普京还签发了总统令,扩大车臣行政首脑卡迪罗夫的权限,充分给予其自治的权力,使车臣政府和人民成为对抗这股邪恶势力的主力军。

5. 不仅要消灭车臣所有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更要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俄罗斯权力部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就必须消除滋生这股恶势力的土壤,不让其有再次崛起、泛滥的机会,为此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值得借鉴、学习。

应当吸取的教训:1. 要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间差距。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社会经济生活处于混乱之时,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所有其他社会生活必然也是无序的,而这恰恰是极端势力得以发展、反社会思潮得以泛滥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车臣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失业严重,从而导致大部分居民生活贫困,产生了信仰危机,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养家糊口,不少人被迫拿起了武器。

2. 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加大对青年人教育的力度,抵制外来极端思潮的侵蚀。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判断分析事情的真伪、善恶,抵制极端思潮的侵蚀。车臣居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特别是青年人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无法探究,不

懂得伊斯兰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古兰经》和《圣训》是反战争、反暴力、反犯罪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被诱导而走上极端。

3. 对极端势力不能姑息养奸、放任自流,应早出重拳,将危害国家安全的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1991年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独立主权国家时,俄当局虽不承认,但也没马上采取军事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车臣分裂势力的气焰。在车臣分裂势力与激进伊斯兰教派相互勾结,并在精神上控制了信众时,已是难以解决了。

4. 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加强中央政府权力,避免国内问题国际化。从俄罗斯独立到1999年,俄罗斯的经济连年下滑,综合国力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了中央政权危机和国外势力对车臣内政事务的干预,也使得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去彻底解决车臣问题。这使普通车臣居民对中央政府失去信心和希望,而对极端势力却是个鼓舞。

5. 在处理边疆地区危害国家安全的恶势力时,要争取邻国谅解和支持。目前仍有一股车匪盘踞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边境的潘基西山谷,俄格在处理这股车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边境冲突逐渐升级,两国关系频频告急”^①。影响着区域稳定及合作,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恶果。

6. 应当出台针对伊斯兰教的可行性政策,避免事态发展扩大。俄媒体称:迄今为止,俄罗斯没有出台针对伊斯兰教的可行性政策,官方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实际上是采用限制的做法。这容易引起“文明间的冲突”。实际上,伊斯兰教是世界伟大宗教之一,促使其在车臣的传播和本土化,有利于维护车臣的稳定,同时也能让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真正感受到俄罗斯是一个多种文明相融的大家庭。

7. 警惕和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渗入境内和染指政权。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形成是经过一个过程的,首先是境外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渗入和传播,接着建立政教合一的组织,最后武装信徒从事分离和恐怖活动,从而威胁着俄罗斯联邦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责任编辑 刘庚岑)

^① 王郅久:《潘基西谷地,勾起旧怨新仇》,《世界知识》2002年第19期。

SUMMARY

The Trend of Evolution of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expounding the trend of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Russian constitution in the new century as well a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It makes a special exposition on the same and different view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on constitutional revisions, the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procedur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The author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will continue to play its role in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to come. A basic judgement i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will not change easily.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 depends mainly on two points: 1. Whether i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era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2. Whether the change of the era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rais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itution?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the current Russian Constitution leaves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Current Un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Twelv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eight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had established a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prior to 1989. Some of them had even set up an initial system of un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system. But due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time, both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institutional systems existed only in name. After the drastic change, the 12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practiced the multi-party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national do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 set up and genuinely carry out the unconstitutional office examination system. Over the years, the current un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system has been in operation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urt has basically performed its functions and decided on a large amount of unconstitutional cases. It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further ensuring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law, in safeguarding the constitutional rul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itizens as well as in restraining the powers of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However, the courts in many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still sometimes subjected to restrictions from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when examining and passing judgments on unconstitutional cases. To realiz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thoroughly prohibit and root out the occurrence of unconstitutional act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set up and improve the un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system itself, but also to consistently improve the political system as a whole,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Root Cause fo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Islam Extremist Forces in Chechen The Islamic religion showed certain special features of localiz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folklore and traditions after it found its way into Chechen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ut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most of the subsequent period, it did not show any extremist tendencies. In the 1990s however, Islamic extremists rapidly expanded in Chechen, posing a permanent serious threat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state security of Russia. To get a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social factors, ideological crises, penetration and support from Islamic extremist forces outside and policy failures of Russia (Soviet Union) are the main reason underl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ing into the formation and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t forces in Chechen will benefit us with usefu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